

边燕杰 主编



# 市场转型与 社会分层

——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

主编 边燕杰 副主编 卢汉龙 孙立平

---

# 市场转型 与社会分层

---

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

---

---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边燕  
杰主编.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  
(社会与思想丛书)

ISBN 7-108-01562-5

I. 市… II. 边… III. 阶层-分析-中国  
IV. D6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0685 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2年2月北京第1版

200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23.375

字 数 516千字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39.00元

# 美国社会学界的中国 社会分层研究

(代序言)

边燕杰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世人瞩目的巨变,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随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在美国社会学界,围绕中国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的关系,自80年代以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于九十年代引发了一场颇具影响的学术争鸣。这个译文集收录的学术论文,是截止1996年围绕这一争鸣的研究成果荟萃。通过她,读者将较完整地了解这一争鸣的学术脉络,弄清美国社会学者如何分析经济改革时期的社会分层问题,掌握他们的最新理论和研究发现,在扬弃中加强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本译文集的目的。

关于中国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关系的研究,发轫于倪志伟在1989年10月号《美国社会学评论》上的一篇重要论文。这篇论文虽然是分析厦门农村地区1985年户均收入的结构,但理论指向是社会主义国家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社会分层体系发生变化的规律性问题。为此,文章的题目是“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到市场”,而“中国”并未出现在题目中。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个理论将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两个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认为从前一个形态向后一个形



态转变过程中,必然引起社会分层体系的规律性变化。文章的学科意义在于它的高度概括性,涉及了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社会变迁的规律性问题,社会经济制度变化如何影响社会分层体系的变化的问题。除了这些理论层面的原因,中国正在经历着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向社会学理论提出了空前的挑战,为社会学家提供了绝好的理论实验场,而在中国能进行大规模的资料收集工作,也使有关中国问题的实证分析成为可能。热爱中国又长期从事中国研究的社会学家积极参与关于市场转型论的争鸣;关心中国发展但不甚了解中国的“主流”社会学家也密切注视这一争鸣,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开始研究中国。这一局面导致了《美国社会学学刊》于1996年8月号专辑探讨中国和东欧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的问题,为这一研究做了历史记录。现在,这一研究仍在热烈地进行着,新的观点不断涌现,新的研究问题也不断地被提出来,特别是这一研究已经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相信他们的加入将大大提高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希望这本译文集有助于我国学人系统了解这一研究。

译文集的编辑工作始于1996年底,国内和海外十多位社会学同仁参加翻译,三位编者对译文分章初校,我最后总校,全过程历时两年。所收录的论文是从100多种社会学发表物中遴选的。遴选时考虑了三条标准。第一,为了比较系统地做介绍,我们拟定了四个部分,即改革前的社会分层研究,改革时期农村社会分层研究,改革时期城市社会分层研究,理论争辩和研究瞻望,各部分入选的论文数量差不多。

第二,入选论文的学术价值是得到公认的,对理论的探讨和进一步的研究有重要影响。所以,美国社会学界的三大学刊,《美国社会学评论》、《美国社会学学刊》、《社会力》,以及国际汉



##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

学研究的最高学刊《中国季刊》，入选论文最多。应说明的是，许多实证分析文章应用了统计分析模型和技术，一般读者会感困难。但这个译文集的主要读者是社会科学研究者，所以我们仍选用了这些论文。

第三，注意收录与我国学界有联系，特别是对中国社会学的重建有影响的学者的论文。为此，入选论文的作者中有不少是中国社会学界的老朋友，曾在中国讲学，实地研究，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他们也是美国社会学界一流的中国专家，这包括（以英文姓氏为序）戴慧思、盖尔·韩德森、林南、倪志伟、白威廉、魏昂德、怀默霆。有些作者，如芭芭拉·安德森、约翰·罗根、菲丽斯·摩恩、伊万·泽林尼、南西·布兰敦·图玛，尚未成为中国专家，他们本来是研究美国、前苏联、东欧或其他国家的，并已确立其学术地位，但有感于中国 80 年代以来的变化，转而研究中国。作者中的中国学者，边燕杰、谢宇、周雪光在美国任教，李放、卢汉龙、翟凤英、折晓叶在国内从事研究工作，都以研究者的身份参加了有关中国社会分层变动的学术讨论，并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影响西方社会学者的中国研究。

我从 1988 年开始注意美国社会学界对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1991 年在美任教以后又直接参加了有关的学术讨论。现借作序的机会，对文集涉及的主要论点及其理论背景做些概述，并就有关的问题谈几点心得，与国内学界朋友交流、切磋。共分四个方面：一、市场转型论发表前美国社会学者研究中国社会分层的主要理论成果；二、倪志伟市场转型论的主要内容和他对该理论所做的修正；三、与市场转型论相左的理论观点及其研究发现；四、关于市场转型论仍在争辩的一些问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对国内发表物未做涉及。

# 一、关于改革前社会分层的研究

## 社会经济平均化的研究

对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分层较为系统的社会学研究,最早的发表物是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1975年在《中国季刊》上发表的“中国的不平等与分层”一文。在该文发表的70年代,中国刚刚向西方开放,但是西方学者在中国做深入的社会研究,尚属困难。可行的研究途径是阅读报刊文献,有一些学者被允许进入企事业单位做访谈,也有一些学者被允许住在农村一段时间,进行观察研究。这些在中国做短期访问的各种各样的西方人,回到本国撰写了观后感和记述,发表在报刊上。怀默霆的文章就是分析这些第二手资料的结果。

怀默霆所用的第二手资料,主要记录了中国居民在文化革命期间的状况以及他们对文革前、文革初的状况的回顾。怀默霆选取的分析角度是革命后中国的分层和不平等,对资料在认真分析了可信度之后做了取舍。他采用当时美国社会学界得到公认的社会不平等的分析框架,即从阶级分化、结果不平等、机会不平等三个方面分析中国的分层体系。

在阶级分化方面,他认为50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农业集体主义政策,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成功地革了前上层阶级的命,但毛主义中国的办法不是像列宁、斯大林的苏联对旧有的剥削阶级进行大规模的人身迫害,而是用群众斗争的方式对他们

进行思想改造,同时铲除他们借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从结果不平等的角度,怀默霆集中考察了经济收入的不平等状况,特别是1956年以后城市工资收入者的状况。他用大量篇幅说明五六十年代工资制度的变化,一些细节情况今天年轻的社会学学生未必了解。比如,他介绍了毛泽东将自己的工资从行政一级调到行政二级,成为工资平均化鲜明的例子。当然,怀默霆的分析并没有侧重于一二个范例,而是测量了几个重要的工资尺度的结构和可能的人员分布。他的结论是,虽然当时实行的工资制度保留了一定的差别,但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比较,中国的工资收入差距是最小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更不能相比了。他的这一结论在1984年他的另一篇研究中国性别差异的文章中重新提及,并分析了中国的最新统计资料,与西方、苏东各国做比较,对这一结论做出较为透晰入里的数量分析。

对于中国改革前的机会结构,怀默霆认为,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比较,毛主义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机会比较平等的社会。所谓的机会平等或不平等,西方社会学教科书中主要指一个社会里人的就学、就业等是否机会均等,或在多大程度上不平等。在美国,人们认为最不平等的机会结构就是黑人和穷人的孩子不能像白人或富人子弟一样上大学,即他们上大学的机会被剥夺了。怀默霆研究中国的机会不平等没有涉及就学、就业的机会不平等的问题。他的着眼点是新的上层阶级的特权如何。他列举了毛主义下的中国上层阶级确实享有一定量的特权,如独立管理的住宅,有专供商店,子女被送到特别设立的学校等等。但他着重指出,享有这些特权的上层阶级其人数不多,其享有的特权也比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要小。通过三个方



面的分析,怀默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毛主义下的中国比之旧中国,比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

与怀默霆持相同观点的另一位社会学家是白威廉(William Parish)。这两位同时代的社会学中国专家,曾长期合作,共同发表了两本非常有影响的研究著作,一本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国农村》(1979年),另一本是《中国的城市生活》(1984年)。白威廉有关中国平均化的观点,虽然也见著于1984年那本书中,但他于1981年和1984年独立著文,系统地提出、论证这一观点,所以学术界均以白威廉为这一观点的提出者。这里所选译的是他1984年《中国的非阶层化》一文。

白威廉的研究问题是:文革十年与文革前相比是不是真的更平均化了?这样一个表面看上去不成问题的问题,对于一个美国学者来说却是非常难搞清楚清楚的。因为,帮助他搞清楚这一问题的资料对于他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在白威廉从事这一研究的七十年代中下期,中国的统计资料尚未公开,外国人到中国境内做大型研究尚不允许。为此,白威廉的资料收集工作是在香港进行的。他和他的同事先后访问了133名从大陆各省50个城镇到香港的移民,通过他们对邻居的介绍,搜集了一个拥有2865个邻居的样本。他的平均化观点就是通过分析这个样本得出的。这是美国社会学者第一次用大型调查资料来分析解放后的中国社会的分层状况。

白威廉分析了结果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两个方面。分析结果不平等是从收入和消费两个角度入手的。他发现,中国七十年代的收入不平等,无论家庭收入还是个人收入,都比市场型的发展中国家低。如个人收入,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20,而市场型的发展中国家是0.54;这两个系数在家庭收入方面分别是0.25和

0.46。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比较,不平等程度相近、略低。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物品并不是从市场流通的,而是从行政渠道分配的,所以,白威廉特别重视消费品的分析。首先,住房的消费是半福利性的。他发现,领导比工人住较宽敞的房子,而高级专业人员的住房面积比工人还小。与其他国家相比,他发现中国城市平均每人居住的房间数总是小于1(这个发现,在中国老百姓来看是多么平常,而对于住惯多房间寓所的西方教授竟是一个重要的比较社会学的发现!)。其他的发现也很有意思,比如中国的洗澡设备“可能只是在厨房或厕所内装一个水管龙头”。家庭耐用消费品的分析发现,风扇、照相机、电视机拥有量,城市越大其户均拥有量就越高,哪怕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家庭收入一样也还是这样。另外,收入水平和户均人口一样,但干部行政级别高,则拥有自行车、缝纫机的家庭的比重就高。相反,高级专业人员在任何耐用消费品方面都和工人大致一样,没有特权。

白威廉的分析重点是机会平等与不平等问题。首先他做了代际比较。从1930年到1978年,每十年算一代,共有五个代际群体。以1930年代群体为基点,受教育的年限是逐代增长,而职业等级和收入则逐代降低。美国的情况是,受教育年限逐代有增长,职业声望大体保持不变,收入是中年人高,青、老年低。那么,中国城市居民是如何获得教育、职业和收入的机会的呢?白威廉采用了美国社会学界的地位获得模型分析这些问题。

这一模型的背后假定是:如果一个人在获得社会地位时(如教育,职业,收入)完全靠个人努力,不靠家庭背景或先赋性特征(如年龄、性别、阶级、种族等),说明社会的机会分布是极为平等的。反之,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是靠个人努力,而只靠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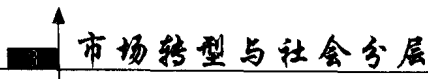
背景和先赋性特征,则这个社会的机会分布是极为不平等的。当然,任何社会的机会分布都不可能是这两极,而是在这两极之间有着程度不同的机会不平等。所以,分析两个社会之间哪个更平等,或者分析一个社会内部两个不同时期哪个更平等,可以通过地位获得模型来进行。白威廉就是用这个模型来分析中国文革和文革前的两个时期,人们获得教育、职业、收入三个重要的社会地位的机会不平等问题的。

白威廉将他的样本按照 20 岁生日时是 1966 年以前还是 1967 年以后分为两组,然后,用父亲的教育、职业、阶级成分测量一个人家庭背景,用年龄和性别测量一个人的先赋性特征,用个人的教育水平和职业作为个人努力指标。他对教育地位获得过程的分析发现,文革前获得高教育水平,其父亲往往也是受过较高教育、从事较高职业的,但这两种联系在文革中被割断了。另外,文革前男性比女性优先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而文革后男女受教育的机会大体一样。这些发现说明,文化革命对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状况有了很大冲击,以后的情况是更平等的。

职业地位的获得过程有些不同。文革前,父亲的职业地位高其子女的职业地位也高;文革后,这一点未有改进。但是,文革前职员、商人、资本家出身的青年往往比工人、农民的子女更能获得地位高的职业,而文革后这一情况颠倒了。这说明从一种阶级不平等向另一种阶级不平等的转变。最后,在文革前,教育水平高的人往往更有机会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但是文革后这一情况不复存在了;无论你的教育水平如何,与从事什么职业都没有太大关系。这说明是机会平等向机会平均的倒退。

收入地位的分析未有如此精彩的发现。比较有意义的分析结果是,对教育程度的收入回报,文革前是正的,但文革后是负

---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

的。这说明,白威廉 1970 年代的样本已表现出 1980 年代中国城市收入结构的脑体倒挂的现象。白威廉用许多表格、图示证明,文化革命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进行了彻底的洗理,将中国从一个革命后比较平均的结构推向几乎是“非阶层化”的大平均主义的结构。他对这一趋势,结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表示了他的担忧。他总结道:全社会内实行极端平均主义的前景并不令人看好。1966 年之前的中国的比较温和的平等状态,其前景倒是好的,如果在这样的模式下,未来的平均主义的国家将不但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更好地切断代际继承的链条,而将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提供高度平等的条件,以及某种程度的安全保障。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 工作单位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研究

社会分层研究必须首先确定社会地位指标。在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社会地位是职业。这是美国及西方社会学的普遍认可的观点。比如,从 1967 年布劳、邓肯《美国职业结构》以来,“地位获得”研究一直是以分析职业地位的获得为中心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一观点真的成立吗?

唐纳德·特赖曼(Donald Treiman)是这样认为的。他研究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获得过程,提出在工业化程度低的社会,职业地位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依赖家庭背景,因为职业的分化程度不高,父子的职业知识、技能、机会的传递比较容易。但在工业化程度高的社会,职业分化的程度也高,父子职业知识、技能、机会的传递比较困难,求职者往往需要一定的教育水平和前期职业培训,才能获得较多的机会,谋求一份称心的工

作。所以,工业化程度高的社会,将打破父子职业地位继承关系,代之而起的是以教育为中介的职业地位获得模式。这一理论被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实证资料所证明(见特赖曼1970年论文)。

林南和边燕杰利用天津1985年户卷调查资料,于1991年在《美国社会学学刊》发表论文,阐述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见解。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经济资源不通过市场进行分配。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当资源通过市场分配时,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通过市场分配时,职位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回报都是通过市场调节的,所以,以职业为核心的地位分层体系就产生了,地位获得分析自然以职业地位分析为核心。可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资源是国家通过国家科层组织,按企事业单位的各系统进行分配的。享有和使用资源的承受者不是个人,而是通常所说的工作单位。不但财、物等一般经济资源被单位占有、使用,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也被单位支配。劳动力是由国家分配给单位的,劳动力不允许自由流动,劳动力市场不复存在。在这种条件下,劳动分工只表明工作性质的不同,而职业分化并不一定说明职业可以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经济地位,因为劳动报酬(工资、待遇、福利、向上流动的机会等等)并不一定有相应的职业分化。相反地,单位之间的分化往往表明地位的不同,因为单位所占有的经济资源不同,而这些资源往往是各单位职工劳动报酬的基础。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研究地位获得过程,应该着重研究“单位地位”,而不仅仅是职业地位。

天津1985年户卷调查资料涉及了一个重要的单位地位指标,即所有制性质——国有、非国有。林、边的分析就是围绕这个

指标进行的。(在以后的研究中,边燕杰又探讨了其他的单位地位指标,如单位的行政级别,行业地位,人员规模等等,在他的1994年的著作《中国城市的工作与不平等》中有详细论述和分析。)他们发现,当用这个指标测量父亲和子女的社会地位时,父子单位地位的传承关系是非常强的,虽然父子的职业地位的继承关系已不复存在。这一发现具有两点理论意义。其一是证明特赖曼的工业化地位获得理论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并不能偏离工业化的道路来创造机会平等的职业结构。其二,社会地位的确定和测量,必须考虑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而不能依赖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发现出来的所谓“通用指标”。因此,社会地位指标的特殊性,将是跨国分析的必要前提。

在林、边以前,魏昂德(Andrew Walder)从权威结构的角度深入研究了单位现象,在他1986年的著作《共产主义新传统》中提出了单位依附理论。(这部著作于1995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繁体中译本,简体译本也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的中心问题是探讨中国国有企业内部的权威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相关的单位依附理论包括三个命题。第一,当单位占有和使用经济资源的条件下,商品市场不发达,许多生活消费品是通过单位分配给职工及其家庭的,所以造成了工人对单位的依附。第二,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体系,事实上是经济资源由劳动者创造,但由国家统一分配的体系。这种统一分配又称“再分配”。但是,国家的再分配功能是由单位实现的,因为没有单位,国家完全不能进行再分配。所以,国家依附单位组织进行再分配。第三,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共产党一党领导下进行统治的。统治的手段是通过各级组织,特别是工作单位组织,对人民进行政治控制。所以,政党依附单位组织实行有效的政治控制。

单位依附理论说明了工作单位在中国作为政治经济地位是何等重要。在 1986 年的著作中,魏昂德只研究了大型国有企业。但是,中国的其他类型的单位组织也是如此重要吗?如果是同等重要,那么,单位地位的分化可能是很小的。但事实上,单位地位的分化是很大的。正像魏昂德在 1986 年就已经意识到的,单位地位分化在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之间是很大的,而在国有单位中,大、中、小企业的地位分化也是很大的。地位越高,三种依附就越重。究竟如何测量单位地位呢?换言之,单位是如何“阶层化”的呢?魏昂德 1992 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再分配经济中的产权与分层”的论文,分析了单位层化的规律性。

他首先说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的层化是由盈利能力来决定的;有能力盈利,就可能使资本积累和集中,扩大再生产,增加劳动报酬,发展成垄断性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企业也是可以盈利的,可是单位的层化并不是以盈利与否来决定的,因为盈利的单位并不一定享有利润,而不盈利的单位往往可以从上级主管部门获得补偿资金,以保证它们的存在。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魏昂德认为,那是由于公有制下的单位没有赋予明确的产权,即占有生产资料、转移生产资料、使用生产资料、分配从生产资料转化出来的利润的权利。由于没有这些产权,单位必须交出它们的利润,而单位在公有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不由其生产的利润(或对国家贡献大小)来定。那么单位地位是如何来决定的呢?魏氏认为,那是由单位与其上级主管部门的关系来决定的。

“上级主管部门”,即国家机构中主管经济组织的某一级机关,在魏氏看来是真正的产权拥有者。这些主管部门决定所属

单位的命运,即它们的经济计划、预算、人事调动、工资、奖金和福利等等。最重要的,这些主管部门代表国家收缴单位的经济所得(利润),也代表国家保证盈利和非盈利、运行良好和运行糟糕的所属企事业的存在和发展。所以,“上级主管部门”的地位低,则所属单位的地位也随之降低。由于“上级主管部门”的地位是由所属政府组织的行政层次决定的(中央、省、市、区、街),所以,单位地位也应该按照这层关系而测量。魏氏将这些行政层次称为“预算级别”。

为了证明他的单位层化理论,魏昂德分析了1986年天津的户卷调查资料。结果表明,职工的住房、工资、集体福利确实是按单位的“预算级别”来排列的。调查资料列举了11项单位办的集体福利项目(医疗服务,托儿所,幼儿园,食堂,图书馆,班车,旅游活动,等等),除一项外(运动设施),每个福利项目都与单位的预算级别成正比;而单位预算级别对每个福利项目的净影响(剔除单位规模和行业的影响),是很强的。另外,单位级别越高,单位办的集体福利项目就越多。最后,单位级别越高,单位建房的能力就越大。这些结果表明,再分配经济的社会分层体系,单位地位是很重要的分层标准。

##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机制

从吉拉斯(Djilas)1950年代的《新阶级》开始,西方研究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学者,注重政治权力作为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机制,集中体现在“精英阶级”这一概念的应用上。吉拉斯的精英阶级概念指的是从事国家和经济部门管理工作的革命官僚,意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忠诚和管理权力代



替了经济所有权,成为人们步入社会上层的机制。泽林尼(Szelenyi)于1970年代提出的“再分配精英”概念表明,精英阶级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再分配过程;这一阶级控制着生产活动,并分配公共财产所得。但泽林尼提醒人们注意,像匈牙利共产党执政40年后的80年代,精英阶级包含官僚和高知两个部分,官僚和高知同时享有再分配实惠。这一观点隐含两个假设:一是权力结构的分化,二是政治忠诚和文化教育同是向上流动的有效机制。

魏昂德“职位流动与共产主义的政治秩序”一文是阐发这一问题的。基于对中国的研究,他同意社会主义精英群体包括管理者精英和专业化精英两个部分的观点,但同时强调进入精英群体的途径、标准、后果,在这两部分中是泾渭分明的。根据实证资料魏昂德提出,进入管理者精英的途径需要有高学历,良好的政治素质,其职业享有相当的社会声望和权威,并有可观的物质利益。与此不同,进入专业化精英的途径,需要有学历,但不要求政治资本,其职业的社会声望高,但确给予较少的权威和物质利益。他的有选择的政治审查和接纳的模型,是分析精英阶层的形成过程的新观点,主张透过社会流动结构观察和分析政治秩序。

分离了的再分配精英的研究提示给我们的是,人们的社会流动受其政治资本和教育资本的个人层次的制约。此前提到的工作单位地位的研究揭示,个人所在的单位是影响社会流动的组织层次的机制。个人和组织机制是如何同时影响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观的呢?边燕杰和卢汉龙的论文提供了他们的分析。从泽林尼再分配理论出发,边、卢认为,社会主义精英既是政党国家再分配功能的代理人,又是其控制功能的代理人;前者表